

“致中和与排中律”

——关于话语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游正冬

随着全球化步伐在迂回曲折中不断推进，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冲突与融合日益显现，其中全球公共治理的探索愈发需要话语体系的重塑和支撑。十八大以来，中央十分重视话语体系建设，这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内在必然要求。那么如何贯彻和落实好这项工作呢？它需要我们借鉴历史的经验，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思维规律”和“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等重要论断来探讨。下面就谈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中国历史的启示

任何一个国家在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需要以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内在的根本动力和有力保证。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讲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并受人的思维方式和国家人文历史、人的价值观念、信息传播方式等深刻影响。从中国的历史看，远有秦始皇选择法家治国，试图继续以“马上治天下”，结果因为法家“刻薄寡恩”而导致帝国的迅速崩溃；汉初还有以道或以儒来治国的意识形态之争，直至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选择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句话，既不出自董仲舒，也不出自汉武帝，且与事实不符，应予摒弃而采用班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说，实际上“罢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经》”而非“独尊儒术”。我们从六经的内容《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或者设五经博士的教育内容《诗》、《书》、《易》、《礼》、《春秋》）来看，都有完整的关于中华文明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等理论的阐述，故而能为两千多年中国的历代王朝所遵循。清朝末年遇到“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华民族在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对意识形态的选择也非一帆风顺，从 1919 年到 1923 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最终马克思主义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思想理论的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中以《矛盾论》和《实践论》等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认识论精髓相结合，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正确选择及其话语体系建设对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

二、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启示

文明复兴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客观现象是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西方社会走过黑暗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文化、科学、经济、艺术等领域可谓群星灿烂，那么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历史的客观现象告诉我们，除了吸收东方文明的自然神论、在宗教领域实现人神关系的调整外，还有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笛卡尔的《方法论》和培根的《新工具论》发展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的认识论武器！它武装了最广大的社会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他们应用归纳法通过科学实验发现了物理、化学、天文等各领域的客观规律，使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而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建立以来，成为最广大劳动人民改造客观社会和自然界的强大武器，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辩证逻辑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应用如何呢？正如钱学森同志晚年反思的那样：“‘辩证逻辑’是什么？讲道理比较容易，具体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用不好会犯错误，原因是没有形成规律。作为思维科学基础的辩证思维理论如何进一步规律化也是抽象思维学的一项艰巨研究任务”（何新《哲学思考》，时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9 页），这一点无疑现在要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它将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最强大、最根本的思想武器。

三、佛教中国化的启示

任何一种宗教的建立和传播本身都以一个话语体系的形式而存在。佛教自东汉明帝（公元 67 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反复地消化、吸收和中国化的创新，在当时国家未得统一和交通资讯落后的背景下，花了近 500 年时间。具体从时间维度看，其标志性事件为从天台宗的创立（天台宗二祖北齐慧文大师，从事佛教活动大约在东魏和北齐之间（534 年—577 年），到唐朝国家统一后，再通过 70 年左右酝酿，直至禅宗六祖惠能才彻底消化外来的佛教文化。如果从文化消化吸收的内涵来看，实际上是对天台宗初祖龙树菩萨《中论》开篇“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之”的“八不”偈颂的中道义，也即从认识论和逻辑学层面的充分消化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核心体现在“八不”“中道义”与中国文化精髓中的“中观、中道、中庸”在义理上实现了充分的共振与融合。

而西方话语体系的传播，近代以来可以从明朝利玛窦来华（1583 年）算起，已近 430 年了。新中国的成立已经 68 年，因此，如何消化西方文明，当前依然是摆在中华文明复兴进程中的重大历史课题。我们看到现实中不少知名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的，诸如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他们认为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等等似乎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因此，当前我们积极探索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正视并回答好这些问题。由于认识论和逻辑学是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根本，因此要实现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我们必须从认识论、逻辑学的层次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消化并吸收好西方文明，否则难免沦为讳病忌医、不得根本，结果也是难以服人的，归根结底是理论不彻底的表现，今后在文化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也必将遇到重重的波折和阻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什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延续中华文明血脉的必然要求，而如何中国化，需要借鉴上述佛教中国化和西方文艺复兴等的历史经验——从人类文明的深层——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去探讨。因为哲学就是认识论，而逻辑学是思维工具，它最能转化为人们的思想武器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方法，所以这是根本的切入点。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即列宁强调的：“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40 页），并指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的统一。那么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论》和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精髓——阴阳之道是什么关系呢？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大是大非的大问题！

为此，我们可以放宽历史的视野，从战略的高度来认真寻找人类思维深处的共同点：为什么西方的形式逻辑强调“排中律”，而与此对应的东方文明却非常强调“致中和”及“中道、中观与中庸”呢？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正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东西方文明深处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发生作用的生动体现。众所周知，“排中律”的形式逻辑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而唯物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注重“矛盾统一体”中关于“中介”及其“转化”作用，强调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去认识矛盾，并深入于矛盾双方之中去驾驭矛盾、转化矛盾，把握好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度”，其实质难道不是三值逻辑（这里是指从定性的角度讲的）？再有《易传》里提出的“三才两地而倚数”的二值、三值逻辑及其组合和转化又正是我们国学的精髓，因此，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关于“中介”和普遍联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学说，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的哲学精髓嫁接融合的核心内容与转换枢纽。

五、要高度重视毛泽东晚年的两大学术遗案研究

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成长脉络涵盖了清末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代领袖，从 1957 年到 1965 年亲自召集诸多学者到中南海开展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研讨；同时他晚年也非常重视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哲学与教育思想的学习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学术理论课题。值得我们当前开展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同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当我们了解《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写作过程后，就更容易理解他晚年关注的这两大学术问题绝不是他个人偶然的、特殊的爱好，而是因为这两个学术内容涉及到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现实需要，涉及到东西方文明深层思维方式的区别、冲突、互补、融合、吸收与应用的大本大源，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做好思想、学术和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关注清楚的重要现实方法和需要认真挖掘的战略性文化资源。今后也必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复兴及话语体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学习、研究、发展与弘扬。

六、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及其相互转化蕴含着重大的时代机遇

近代以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都十分重视逻辑学研究，究其原因因为它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者关于人类思维规律——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等重要思想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形式逻辑是古希腊亚里士



多德建立的思维规则，它由“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三大定律组成，经过笛卡尔、培根和近代数理逻辑的发展，作为思维工具和基本推理判断的方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各门科学的研究和计算机运算推理中去，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但是它的应用依然是有条件的，这一点却往往被已经习惯应用它的人们所忽略。具体讲同一律它要求时间变化为零即停滞，也即事物的内涵（质）不能变动，否则 A 不可能等于 A；其次，排中律就是否定事物有亦此亦彼矛盾属性的存在，这导致凡是属于中间过渡属性的事物，它都排斥。因此，排中律实际上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第三，矛盾律表现为不允许矛盾、悖论的存在，它和辩证法肯定事物的矛盾属性方面是有根本区别的。

而辩证逻辑则是在推理的一开始就承认事物内外部的矛盾属性存在，认为事物因为“中介”联接而普遍联系。它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分析矛盾、驾驭矛盾、转化矛盾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事物内外部关于统一矛盾双方的中间属性的客观存在。从逻辑学的角度讲它肯定了定性连续的二分法（区别与西方形式逻辑的抽象同一性的离散二分法），也即包含事物两端加上中间属性这一部分的定性三值逻辑的存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定性的角度提出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三生万物”实际上就是这个涵义。

现实中辩证法之所以被许多人误解为诡辩论，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形式矛盾和辩证矛盾的概念，把构成事物外部的矛盾双方属性当作对某一事物单一抽象属性的矛盾判断，如把辩证法当成既是张三也是李四这样形式矛盾的理论。至于把辩证法当成折衷主义，则是因为当事人在事物矛盾运动过程中放弃了人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因而表现为庸俗的调和论思想。

需要认真说明的是一些人认为这里的三值逻辑不是逻辑，而且与二值逻辑不同，换句话说就是“排中律”的“中”与“中道”、“中观”的“中”不同，显然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认真循序地展开说明：在形式逻辑应用中由于广泛地运用抽象同一性（同一律的要求）而为抽象思维所主导，所以二值逻辑往往表现为没有定性的差别，而只有数量的差别，如 GDP 与 CPI 等都是抽象成货币价格这一同一性来进行数据的加增减除。而辩证逻辑体现为三值逻辑的两端一定是有定性差别的，也即矛盾的不同方面一定有定性之别、有主次之分，且不能单纯用数量多少来进行区分比较。同时它还需要用形象思维来对事物从整体上把握。因此，辩证逻辑一分为二非常注重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非常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和形象思维的研究与应用！钱学森同志晚年的学术理论也研究生动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关于“中”的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形式逻辑强调的“排中律”，作为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实际上仅仅是包含“事物中间属性”也即定性“中道”三值逻辑的一个特例。因为形式逻辑应用的基础是人类的抽象思维，而辩证逻辑需要定性判断，它离不开人类的形（具）象思维；由于抽象来自于具体事物中某一局部的不变属性，因此，形式逻辑的应用范围仅仅是对事物某一局部不变属性（为了保持同一律）的推理判断有效。也正因为这个“某一局部不变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形式逻辑当作研究事物整体矛盾双方属性运动的辩证逻辑的特例。

关于“中”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讲清楚三值逻辑与二值逻辑中提出的“三包含二”的关系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实际上“三”是指除了事物矛盾双方之外，还包含了事物内部具有矛盾的“中间”属性，而“二”也可以看作为“三”排除了中间属性的结果，所谓“虚中”而已。由于把中间属性排除掉，所以必然是非此即彼，进而得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如果包含了中间属性的“三”，由于中间属性刚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介入，并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切入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因而按照中国传统

文化的说法，就可以在这里“执二用中”来驾驭和转化矛盾了。

综上所述，西方形式逻辑“排中律”的“中”具有抽象同一性的特征，它是对矛盾的否定！所以西方的主流学术理论体系往往是一遇到矛盾就认为不对，就避而不谈。而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精髓“中道”、“中观”的“中”则具有定性矛盾双方组合的特征，它是对矛盾的充分肯定！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理解了二值和三值逻辑之间（实际就是抽象离散二分法与定性连续二分法）的关系及其转化，具体把握了“中”的内涵，我们就能深刻地把握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思维深层的本质关系，我们就能洞明清楚明东西方文化的客观内涵，进而就能做好“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树立起牢固的文化自信。

下面再结合具体事物来具体阐述上述结论。如果讲人类面临的客观事物，其构成矛盾两端的属性变化速度相对于人来讲不大，或者其两者近乎同质，那么我们用切割和还原论的办法来分析事物无疑是有效的，比如对某一金属的结构分析就可以这样。而一旦人类面临的事物矛盾两端运动变化速度很快或者性质明显不同，如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变化多端，那么试图用“排中律”的办法，也即以一些别人现成的经验或者书上的条条框框为是非、来个非此即彼，没有看到具体条件的变化需要适时调整对战局的判断，那么失败显然是难免的。再举个例子，发电和用电必须瞬间同时平衡才能保持电力系统的稳定，一旦间歇性电源如风电、太阳能越来越多以后，储能这项技术及其应用就显得异常重要了，以至于电力系统的稳定离不开它。而储能设备的哲学含义恰恰是“亦此亦彼”——既可发电也可用电的形成对立矛盾双方统一体的对应物。形象点讲这就是三值逻辑即“中道”存在的客观性和重要性。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如果放大了事物中间的矛盾属性，以至于人都看不到事物矛盾的两端，或者讲人的认知深陷于事物矛盾双方的交集之中，即呈现在人面前的本身就是“亦此亦彼”的“庄周梦蝶”与“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时就犹如遇到了量子力学的薛定谔猫，或者经济学里所谓的理性预期、逆向选择及索罗斯强调的反身性原理等等，出现主观意识本身已经构成了被认知客观事物的组成部分了，那么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呢？这时人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也是我们东方文化非常强调道德伦理建设的重要认识根源。推而论之，这正说明今后人类社会进入信息互联网与虚拟现实世界以后，客观上将迫切要求应用辩证逻辑来分析和认识客观世界，并呼吁人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具体应用，必须讲究其具体的边界条件、适合范畴和现实意义。当前我们尤其要看清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及其应用和互相转化对东西方文明融合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七、关于逻辑学问题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中国问题经常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个没有逻辑思维的国度，许多“认真的学者”痛定思痛，认为国人缺少所谓的理性思维，为人处事往往为情绪、实利主义或者强权所笼罩，各项管理中经常遇到蛮不讲理或者“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他们认定这种现象存在，究其根源与个人或者组织行为缺乏形式逻辑支撑有关。再大一点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形式逻辑的启蒙。而所谓辩证法则根本无法逻辑化，因为一旦逻辑化就是形式化，也就失去了活的灵魂。事实求是地讲，这些现象都是我们现实社会生活和经济、政治运行中不同程度的客观存在，也是学术和理论层次无法回避而且需要讲清楚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换个角度讲，这需要理解辩证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确定事物定性方面有无结构和规律？辩证逻辑如何构建？如何用来推理判断？事物定性、定量之间关系如何？如何转化？如果再往深里推就是中华文

明发现过什么规律？它是怎么发现、描述和应用等这些文化复兴进程中必须回答的大问题了。显然，这些都需要通过类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解决。而要实现价值观念转变和认识论、逻辑学的返本开新，则需要繁荣哲学与社会科学，需要从认识论逻辑学的层次来探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样的历史话题，这将意味着呼唤一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东方方式的文艺复兴的到来！

八、关于文化复兴与技术支持的关系

文化复兴需要一个受生产力因数推动的理论创新，并从人的内在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向外在社会公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转化、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依各种“中介”的特性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特点，其中体现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以技术为支撑）历来是这个“中介”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讲形式逻辑（主要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与培根的归纳法）被转化成西方所谓的理性思维，进而推动了西方实验科学的蓬勃发展和坚船利炮的产生，它正说明了抽象思维的应用，使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科学技术互为促进和依托条件，进而诞生了所谓先进的西方科学文明的话。那么我们东方文明却也正因为思维方式缺乏形式逻辑的主导而停滞落后。也即反过来讲代表中华文明哲学、逻辑学精髓的“中道”、“中观”、“中庸”的哲学思想，也正是由于缺乏技术的互相促进和支撑，而始终沦为一种“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口头思辨哲学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 页）。随着复杂性科学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的诞生，那么它将支撑什么样的哲学和逻辑呢？为什么西方的政治、经济、数学、物理等领域现在到处出现矛盾、悖论和悖谬呢？万物互联使普遍联系有了技术支撑，而普遍联系则必然促使事物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即“亦此亦彼”定性中道的三值逻辑必然将广泛地呈现于信息时代社会运行与人类思维等各个领域。具体我们可以看到金融领域汇率、利率、资产价格等经济变量越来越呈现出具有主观观相容的特殊属性。再来审视一下当下商业模式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如马云的支付宝为什么叫“第三方支付”呢？社会为什么需要第三方服务？第三方为什么能产生增值服务？为什么能源领域需要储能这样一项“亦供亦用”、“非供非用”的技术和产品呢？这里的“第三”即“亦供亦用”、“亦此亦彼”加上供需双方不就是定性的三值逻辑吗？总之，第三方就是“中道”三值逻辑具体形式的转化！因此，“执大象、天下往”（《道德经》第三十五章），我们在这里应该要善于应用形象思维，去判断人类社会进入的新阶段和发展的新趋势。

互联网革命的精髓在——“两个节点条联线”哲学含义的技术性、人性化展开。工业时代的两点随生产力的变化促进了中间一线功能的变化，信息化时代则是中间一线的技术发展反过来促进了所连接的两点的功能发生变化。如果讲原来两点独立主导的时代，它必须以形式逻辑为思维方式支撑，那么现在为互联网主导中间连接线的时代，我们将不得不请出辩证逻辑、矛盾论来诠释事物的发展规律了，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恰好形成共振，历史将再次深刻的展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一旦技术支撑了哲学思想、逻辑思维之时，那么就必然意味着一场发生在东方文明古国的新的文化复兴即将拉开帷幕。

总之，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一旦获得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就能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到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黑格尔说过“中国的宗教，就是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仔细探索、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9 页），这是非常深刻的！当前，积极探索建立包含定性“中道”（中、度、共、无四字实际上具有共同的哲学含义）的辩证三值逻辑体系，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时代的深层脉搏，那么我就能更加有的放矢，更加自信地建立起新的符合人类进步事业的话语体系。“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符合东方文明的话语体系需要辩证逻辑体系的支撑，辩证逻辑需要信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支撑。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光辉历史的中华民族，必将通过对其传统文化精髓的返本开新而为人类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